

老一辈社会学家视野中的中国农村工业

杨 雅 彬

早在三四十年代,张世文、费孝通、李景汉、张之毅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即对中国农村工业的状况都给予了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及经验。80年代费孝通对中国农村工业的研究,对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历史意义。总结与借鉴老一辈社会学家的理论及实践成果,对中国农村研究乃至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者:杨雅彬,女,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早在2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者即对工人及农民的生计进行过调查。30年代出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社会学者的爱国热忱,为振兴民族经济,对农村工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激励着社会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模式,形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工业研究高潮。

一、确立民族工业的重要地位,走乡土工业发展之路

30年代,我国受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大工业无从发展,民生日益穷困。外国与本国大工厂的廉价产品充斥着市场,给农村原有的手工业以沉重的打击。乡村家庭手工业由于制造技艺的落后及生产者的毫无组织而渐趋衰败。然而,我国农村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民族经济构成的主要部分。农村工业一方面满足人民不可缺少的需要,另一方面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的日常生活要靠它的收入来补充,农村工业的前途如何,确实是我们民族经济致命的问题。

1. 张世文的《定县农村工业调查》^①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张世文等人于1931—1933年对河北定县农村工业进行了调查。其目的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对如何改进与发展手工业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并提出可行的具体方案,从而提高人们的民族经济意识及生产救国的觉悟与责任感。

定县的农村工业调查,分为家庭工业与作坊工业二种。家庭工业是农民于农闲时自行操做的一种副业。定县的453个村庄约有家庭工业120种,分为7大类:纺织工业、编织工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铁工业、杂工业等。每村从事3种家庭工业者最多。定县453村总户数

^① 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为66205户，从事各种家庭工业的约43000户。453村总人口385500人，从事各种家庭工业者约有80800多人，平均从事家庭工业的赢利约占全年收入的8.4%。作坊工业多属整年经营的一种工业，并渐渐摆脱土地与家庭的束缚关系，具有雇佣的性质。定县城关及6区的作坊共有5大类：化学工业、食品工业、木工业、五金业、杂工业，共有1782家作坊，从业人数有19912人。

定县农村工业的调查，有概况与详细之分。家庭工业调查，概况调查以村为单位，包括定县453村的状况，详细调查以家为单位，包括几种家庭工业集中的村庄。作坊工业调查，包括定县城关及453村，城关作坊工业的调查以家为单位，453村的作坊工业调查以村为单位。调查所采用的方法：（1）有的材料采用问题表搜集，有村概况与以家为单位的家庭工业问题表两种，村概况与以家为单位的作坊工业问题表两种，共四种；（2）有的材料不能用问题表去搜集，就根据问题的性质，拟成详细的纲目，分别去调查。如对于各种工业的历史与沿革，各种工业制度的演进，工业品制造工序与方法，所用机械的种类与构造，与工业有关系的各种商业组织，学徒制度内容，包装运销的方法，经济税佣的情形，工业品输出的状况等均采用调查大纲的方法。无论采用问题表方式还是调查提纲的方式，调查者均是在定县实地观察中进行的。整个调查包括了农村各种工业的历史与分布、原料、劳工、制造方法、工业制度、运销及捐税。

张世文用了三四年时间，在翔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家庭工业的前途问题、中国工业制度的问题、发展建设与改造中国工业的原则、建设中国工业的步骤与办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张世文等人认为中国乡村家庭手工业的前途已陷入危机。他们认为虽然中国家庭手工业当时的存在是有理由的，一是农村有家庭手工业制品的原料，二是农家利用农闲从事家庭手工业，三是乡村家庭工业产品的运输和销售都十分便利，四是从事家庭工业不但可补助家庭进款，而且多能得到副产物的收入。但是，一方面由于家庭手工业技术的落后，生产者的无组织，无法与外国的与本国的工厂的廉价商品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工商业渐渐的发达，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与家庭手工业争原料、争市场；再者乡村建设、合作运动及政府对乡村工业的现代化改造，必然影响家庭手工业，致使家庭手工业衰败。

因此，张世文提出中国的工业制度，应集中与分散两者并重。集中的工业应是国防工业、交通工业、机器工业及其他国营的工业，如矿产、动力的供给等国家的命脉工业，这样便于统一集中管理，严密保护和集中运用。关于人民日常生产需要的种种工业，除了非大规模经营不可的，应尽量分散在各地乡村，根据人口的多少、原料的生产、教育的状况、生活的程度、农业的经营、人民的副业、习俗的不同，以及全国整个经济产业发展的计划去分配，去建设。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分散在乡村有许多好处：（一）节省原料品与制造品的运输费用，从而减少消费者的负担；（二）可以吸收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以避免大量流入都市而产生的许多问题；（三）可以增加农村的财富；（四）自然吸引城市金融流入农乡；（五）战时免于敌人整个摧毁工业；（六）尤其是在外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内有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下，大工业无从发展。而分散在民间的工业，则可以利用当地与附近的廉价的原料与劳工，供给当地与附近的需求，如再利用合作统制的组织，则可以与外国资本竞争与抗衡，使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建树起来，解决民族生计问题，打破民族经济的生死关头。

至于发展、建设与改造中国的工业，应把工业建设作为全国整个经济计划里的一部分，并着眼于民族生存的基本需要上，能够达到民族经济的自给自足就行，如要向外开拓市场，应发展以农产品为基础的工业品制造。作为中国工业建设应当根据三个中心去发展：一是国

勤为中心，发展军事与交通工业；一是应当以富源为中心去发展地带工业；一是应以人民需要为中心，去发展县单位的工业。为了中国工业的建设要与教育中培养现代生产技能的内容和有计划的训练培养人才相结合。

张世文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提出中国工业的理论步骤与办法：要把中国的工业整个的、有计划的建设起来，首先要进行全国大规模的调查与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工业、省工业与县工业的建设方案，并指出私人经营的工业，也得与政府的工业计划连接起来，受政府的统制。尤其指出县单位的建设，问题比较复杂，必须先作实验然后再推广。

晏阳初在其为《定县农村工业调查》所作的序言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以往未曾——以后也将无由走入工业资本主义之路，则农村仍未尝不可以保持经济自足的局面。如果应用合作的原则，把分散的原始式的小手工业，组织联合起来，作共同之经营又加以技术方面的研究改良，则农村经济之复兴方可有望。”

当时对发展农村工业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李景汉在《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序中说“有人以为……分散的与小规模的农村工业亦可以以合作的原则联合起来，俾能得到大规模工业的一切利益，而尽力免除资本家的操纵与剥削。还有人以为农村手工业，根本没有维持的可能，机械工业迟早是要打倒手工业的。也有人以为若要保存农村工业，非使现在的农村工业从速现代化不可。也有人主张轻便的小工业是应该分散于农村，不应该使工业都集中于都市。此外，对于农村工业尚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总之，张世文、李景汉认为，以中国农民之众，农闲之多，与人力之贱，得到合宜有利的农村副业，是与农村经济大有关系。若仍任其自然变化，而不加以指导与统制，则中国农村工业的没落必更甚于今日，结果是不堪设想的。要想对中国农村工作得出有把握的结论与提出解决的办法，一方面自然是要看清世界经济的趋势，一方面也须明了本国农村工业的事实。张世文详细周密的调查就是本着此意进行的，该调查具有一般的代表性，不但对认识当时的农村工业的现状有实际的用处，而且也是一部中国农村工业的重要史料。

2. 费孝通对江村改革蚕丝业的调查

社会学家不但对农村工业情况进行调查，而且对如何改革农村工业也进行了调查和研究。1936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调查中，对蚕丝业的改革进行了观察。在靠近发达大城市的江村，蚕丝业是江村居民收入的第二个主要来源，蚕丝业的衰落深深地影响了农村人民的生活，因此江苏女子蚕业学校在江村开展了改革蚕丝业的实验。费孝通正是对这样一个有意识地进行经济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可能性和困难进行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观察。

费孝通通过调查与研究，概括出影响农村工业发展的两种力量，即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两种力量的互相作用导致了情况的变化。30年代，世界经济在衰退，而蚕丝业在世界性范围内向采用科学生产方法的工厂企业发展。西方国家纺织工业技术的发展对生丝生产提出了新的精确的标准。以大批生丝出口的江村，用传统手工缫丝是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因此，生丝需求量下降，价格下跌，家庭蚕丝业衰退，农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与西方国家纺织技术发展相适应，必须把科学方法引进村。但是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必须引起一种从家庭个体劳动到工厂集体劳动的变革。在这样一个集体系统下，生产资料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在组织新工业中选择的社会原则应是人民的利益相关，即新工业组织的原则应是“合作”的。

科学方法的引进,机器的使用,是增添人类幸福,而不是相反。改革是寻找一种正当的办法使用机器,即人不应当成为机器的奴隶,而人应拥有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只有坚持合作的原则,从技术改革所得到的利益才能归于参加生产的人们。费孝通认为改革的蚕丝工业应该继续是一种乡村工业,而且中国工业的发展不应以牺牲穷苦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当时,为了使进步的技术为人们所接受,并为学生找到职业,村庄的工业改革便成为作为变革力量的江苏女子蚕业学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技术学校成立了推广部门,负责向农村地区传播新的技术知识。为了使新的技术知识为农民群众所掌握,在当地领导人和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入股合作原则组织了工厂,工厂遵照改革者和蚕业学校的意见行事,工厂属于合作社的社员所有。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等人于1929年开办起小规模实验工厂,并于1935年重新装备了新机器,出口了最佳产品。

在江村缫丝工厂的实验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一是改革者无法控制市场的价格;二是资金的短缺;三是农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不熟悉投股制度以及行使投票的权利来管理工厂,只关心以利润形式分给他们的实际利益,对工厂的其它工作不了解,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人;四是机器的使用,引起的失业人口增加反响较大;五是城市工业的发展引起农村青年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

费孝通对江村蚕丝业改革的观察,及费达生对改革蚕丝业的实验,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江村经济的调查是费孝通对乡村工业研究的前身,也是对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之开端。

3. 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①

抗战期间,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由费孝通领导。费孝通、张之毅等对不同社区进行调查,研究了各种社区所遇到的现代化的问题。张之毅于1939年对云南省易门县一个以手工业著称的农村(简称易村)进行了实地调查。

张之毅很仔细的解剖了远离城市的典型内地的易村的经济结构,阐明了乡村工业在整个结构中所占的位置。易村人多地少而贫,全村23家共33人从事编织篾器,占全村户数42.6%。这23家中22家都是田地的收获不够全家人食用,其中11家连食米都不够,编织篾器的家庭手工业在易村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编织篾器这种家庭手工业是在农闲时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活动。这种地域性专门工业的发展,并不一定引起工业和农业的分离,这类工业分散在多数农家,在家庭经济上,农业和工业互相依赖的程度反而更密切。中国的传统工业,就是这样分散在乡村中。

中国乡村工业在农村经济中是必要的部分。人多地少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单靠农业不能维持生活,农民因生活所迫,不能不乞助于工业,而乡村工业正是帮助了农业来维持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的生计。农村之所以要维持这样庞大的人口,一方面是都市工业没有发达的社区,人民除了乡村没有更好的去处,没有出卖劳力的机会,而农村手工业又利益不高,不能离开土地而单独靠工业谋生。另一方面农业技术的低下,非拖住大批人口在乡下不可,因为农业是有季节性的劳动,所以劳力得养着以备农忙之用。这样在农村,一方面要拖住大批的人口,一方面又不能在农业里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力,再一方面农业的收入又不足于养活他们,因此在农闲基础上用于解决生计困难的乡村工业就发展起来。

^① 张之毅:《易村手工业》,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张之毅在易村手工业调查中，将农村工业分为二种，一种是家庭手工业，在易村主要是编织篾器，另一种作坊工业，在易村是造土纸的作坊，这是传统工业中的一个重要形式。家庭手工业在人多地少的农村是利用过剩的劳力，而易村的作坊工业，是发生在土地贫瘠的乡村中，它是利用过剩的资本，并有专门工作场所的工业。易村的土纸坊，投资的利息高至六分，比农业利息高五倍，而得利高的是工具的所有者，并不是劳动者。尽管雇主与雇工大多是亲戚关系，但还是具有剥削的性质。作坊工业如果算是传统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这种萌芽在运输困难和市场狭小的阻碍下被遏制了，从易村的土纸作坊的经营中可以找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难以取得发展的原因。由于作坊工业的资金不能在工业里发展再生产，最后又把“魔掌”伸向土地，使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张之毅在这里说明了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对于农民生活上的不同影响，家庭手工业是救济他们的力量，补助其生活之不足，而作坊工业更促成了乡村中的贫富对立。

张之毅在易村调查正值抗战期间，此时乡村经济崩溃，手工业衰落，乡村工业受破坏。费孝通在自己原有的调查和张之毅调查的基础上，对乡村工业的复兴和前途提出了看法。他在《易村手工业》一书的序言中说：“我们现在所要注意的是都市工业兴起后对于乡村经济的影响。这些影响若是有害于民的，我们得用什么方法来补救，这是第一层。乡村工业本身是否必需以手工业为基础的？我们能不能改变乡村工业的性质使它可以和都市工业并存？这是第二层。从乡村工业到都市工业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可是在中国却另外还有一种新的意义，因为中国本国的都市工业，在西洋先进工业的压力下无法发展。”因此，他提出将一部分可以不集中的工业分散到农村，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广大乡村里农民的生活水平，来换取我们的新工业，一方面又不至于使都市与乡村在发展工业上产生锐利冲突。费孝通特别强调，乡村工业要生存，要立足于战后的新世界里，必须在技术上和在组织上发生质变。

乡村工业质变的第一步是引用机器，使乡村工业不完全等于手工业，把比较精制的部分交给机器生产，那些不必使用机器的部分留给手工业，藉以利用乡村里的多余劳力。乡村工业部分机械化，就是将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在技术上加以联系构成相辅的生产部分。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单有技术上的联系，对农村的经济贡献还不会宏大，因为这种新式乡村工业的发展反而会引起乡村贫富的悬殊。因此，还要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在组织上的联系，要采取合作的方式。这样可以不致使生产工具的所有权集中到少数有资本人的手里，而是分散到所有参加生产的农民手上。用合作的方式组织乡村工业，可以避免张之毅所说的，作坊工业成为集中土地权的魔手，而使农村贫富悬殊。

4. 确立民族工业，走乡村工业之路

费孝通经过30、40年代对不同社区的调查及对比研究，进入理论研究阶段。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重建》中，明确提出确立我们民族工业阵地，在策略上，走乡村工业的路子。

乡村工业主要从事的是轻工业、日用品的制造业、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的加工业。在重工业里大规模的制造单位是技术上所必需的，但是很多的轻工业中制造单位一向并不很大，如果建立在乡村里，比集中在城市，对于乡村人民经济上的帮助一定是更可观的。况且手工业和机器工业是可以配合的，在事实上即使是在高度机械化的制造工业里，手艺还是有重要的地位，在普通的轻工业中手工的成分也常占很大部分。在乡土工业里手工部分尽可保留在家庭里，而把机器的部分集中在小型工厂里，手工和机器配合起来，这样可以说是工厂

社区化，整个乡村可说是一个工厂，小型工厂是个核心，核心的规模可以技术的需要而规定

再者，乡土工业在经济上的优点却有都市工业所不易得到的，最主要的是乡村工业中工资较低。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乡村中所需的费用较都市里便宜，况且乡间生活水平比都市低，因之乡间居民维持生活的费用也低。当然最终城乡生活是要拉平，但在竞争中，在技术、组织、经营各方面乡土工业在初期必处劣势，所以可能设法减低成本的主要因素在工资一项。费孝通特别强调，以便宜劳力来减少成本并不是指资本主义工业组织中的剥削方式，而是在劳动者自有或公有生产工具的组织中出现的方式。尤其是在我们的技术、组织、经营方式一时难以赶上西方的情况下，即使是取消了剥削，我们还得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上去和西方工业相竞争才有希望。他指出“在已经成熟的西洋侵略性的工业经济的滩头，要确立我们民族工业阵地，在策略上，大概不能避免走上复兴乡土工业的路子。”“如果我们民族工业的建立，必然要经过一段艰难的过程，这艰难的过程中不允许担负很高的工资的话，乡土工业是最能适应这过程中的条件的。”^①

费孝通指出，要确立民族经济，走乡土工业之路，这乡土工业必须要有新形式。一方面在技术上求改进，技术的改进是提高生产力所必需的条件，一个社会的生活程度最后也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单就技术上求改进却并不一定能提高社会上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程度，因为这里面还包含着一个分配问题，所以要使乡土工业成为增进农家收入的生产事业，单在技术上求改进是不够的。另一方面还要建立乡村工业的合作组织。我们说中国传统工业大体上可以分三种性质：（1）皇家的独占工业；（2）民间的作坊工业；（3）家庭工业。皇家工业是官方所独占的。民间工业中的家庭工业，是在农闲基础上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是以农业剩余劳力为基础的；而乡村的作坊工业则不然，它的基础是农业里累积下来的资本，它需要特殊设备，雇用技术工人，这种作坊工业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起点。这种工业因为原料、运销的限制，企业不易扩大，资本如不能吸收到工业上的再生产，反而会成为集中土地的魔手。因此，在传统作坊工业中单引入新技术，将会加速土地集中过程，形成更悬殊的贫富鸿沟。因此，要复兴乡土工业，在组织上不能不运用新的形式，这就是工业的所有权属于参加工业的农民，这种工业的组织应当是合作性质的。只有生产者是整个生产过程的主体的合作方式，才能保证生产者获得全部利益的权利，取消剥削成分。

中国的民族工业要发展必须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服务于人民群众。费孝通通过对女蚕校推广部在江村办丝厂实验的观察指出“数千年来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农民和现代技术之间必须有一个桥梁，这桥梁不能被利用来谋少数人的利益，而必需是服务性的。技术专门学校可能是最适当的桥梁。”因此，在技术的需要之下，可以在合作基础上成立服务工厂，把那一部分不宜分散在农家的集中到村单位的小型工厂里，再把不宜分散在村子里的，集中到中心村里为一个区域中的原料生产者服务。

中国的经济复兴资本从哪里来？费孝通指出，乡土是我们复兴的基地。假如土地问题解决了，农村中的财富平均分配了，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到不饥不寒的程度是可以做到的。在此水准上要开始节约，为了长期打算，我们要征服贫穷，只能把当前的享受延迟下去。延迟享受有两条路，一条是强迫，一条是自愿。费孝通的观点是偏重于自愿。因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最有力的动机是“创立家业”，一个勤俭起家的农户经常是要几代不懈的努力。客观的讲这种乡土意

^① 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14、115页。

识有很多方面已不合现代要求，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要自力更生积累资本，要求广大人民抛弃享受的欲望勤俭节约，还得通过传统的意识，来完成这艰巨的任务。因此，费孝通认为，中国积累资本的能力还在乡土的基层，只要土地制度改了，从传统勤俭的美德下手，在所得归所有者支配的奖励下，表现出这美德的实际利益。在乡土基层上着手开始积聚资本，充实生产，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才有着落。

费孝通先生的这些理论，1979年以后得以实现并对推进中国农村的改革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二、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

从1949年至今我国农村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了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1957年费孝通对江村的重访，1979年恢复重建社会学后，在费孝通教授指导下社会学科研和教学单位的社会学者对江苏小城镇的调查研究，以及80年代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都证实了上述的观点。

1. 未恢复的农村工业

1957年费孝通教授重访江村时，与21年前他在江村调查时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1952年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取消了剥削制度，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农村成为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当时已经不是选择哪条道路的问题，而是怎样更顺利的在这条已经选定了的道路上前进的问题。

50年代解放了的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由于扩大了复种面积、水利上的改进、肥料的增加，农业大约增产60%。如果农民的收入来源只是农业，那么农业增产农民收入必然提高，但对于收入来源不只是农业的江村来说就不然，农民的收入是否提高还要看其副业的收入以及农副业的比例。江村当时农业收入大约占55%左右，而农业虽增产了大约60%，但还是抵不过全部副业收入。农民收入是否增加的关键是副业，尤其是对于人多地少的地区更是如此。江村的纺织业、养蚕、养羊、养猪业得不到发展，船运也已停止，靠单一的种植业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困难的。农民生活水平提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副业方面的水平低，1936年江村的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而1956年却不到20%。副业下降的帐不能算在合作化的帐上，而主要是没有很好贯彻多种经营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尤其是在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下，只有农业和工业之间配合联系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工业分散到乡村可以避免集中到都市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过于集中。乡村工业是农业技术改革的动力，对经济技术的发展都有好处，但当时乡村工业没有得到恢复，这种情况使费孝通忧心忡忡。

1966—1976年在农村以粮为纲，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都受到了限制，农村的集体经济强调统一管理，不考虑地区差异，加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农业经济进入停滞状态。由于单打一抓粮食、忽视了工、副业生产，在粮食生产上又忽视了节约成本开支的重要性，加之人口的增长，个人收入停留在1966年的水平上，1979年以后这种状态才得到了全面改变。

2. 乡镇企业的崛起

1981年费孝通三访江村,对江村进行了追踪调查。他看到了1978年后由于改变了抑制农民积极性的错误政策,恢复和发展了农民的家庭副业,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增加。由于农民生活的改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虽然1981年在农村实行了责任制,这只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生产技术和群众的觉悟水平,改善经营方式和贯彻按劳分配,并不是经济制度性质的改变,但却引起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这就是:在农村经济结构中个体经济的增长,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农业比重下降,副业有所增加,工业激增。江村的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江村的一个大队来说,1979年农业收入占50%,副业占23%,工业占27%;1980年农业占收入的41%,副业占19%,工业占40%。由于这个结构变化是在农、副、工三方面都增产中发生的,尤其是乡村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1980年比1978年人均收入增加约1/3。在苏州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结构中的比例,1980年农业占19.6%,副业占13.2%,而工业已占到67.2%。

费孝通指出,从农村经济结构中农、副、工三个方面来看,发展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乡村工业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本地区所产的原料加工制造,中国称作“农工商一条龙”,另一种农村工业是为都市里的大工厂制造零件。由于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苏州地区的农村居民的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些村庄里主要从事工业的人口在比例上超过了主要从事农业的人口。费孝通意味深远地说:“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①

80年代初费孝通指导一个实行分工合作、集体讨论的研究队伍,从对农村的研究进入对集镇的研究,其研究的着眼点首先是把集镇看作是城乡的结合部。费孝通从这个角度提出“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研究课题。他采取的是实地观察法,“解剖麻雀”,由点及面,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方法。集镇50年代进入衰落时期,人口下降,70年代陷入谷底,出现冷冷清清的场面,而8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各地小城镇开始复兴的时刻。各地的集镇怎么会兴旺起来呢?这个问题吸引了费孝通等人的注意。

1982—1984年费孝通等对江苏省的苏南四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苏北四市(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苏中三市(南京、镇江、扬州)进行了调查,看到江苏各地的发展是快的,但也是不平衡的。江苏省的经济水平呈由北而南逐步提高的趋向,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工农比例是“工三农七”,接近长江北岸的中部工农比例持平,过江偏东的苏南已达“工七农三”,靠近上海一些乡村,已出现“工九农一”的比例。费孝通综合这些情况指出,发展乡村工业确是农村经济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费孝通30年代调查江村是由当时该村举办的生丝产销合作社引起的,调查后得出了“人多地少,工农相辅”这个对当地农村经济结构的概括,从此得出了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的观点。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的云南内地农村调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又同样指出,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时隔30年,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变成了现实,事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页。

实证明了他的一贯主张是极为正确的。

3. 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

1984年费孝通除继续在江苏各地跟踪观察外，从沿海到边区，东西穿梭，南北奔走，到1988年底足足用了四年的时间，对各种农村经济发展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费教授特别强调，模式主要是在显示它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今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应当避免强制令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他所说的“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

(1) 苏南模式

苏南地处沿海，人口密集，人多地少，历史上是农村手工业发达的地方，以“工农相辅”来维持农民生活。即使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也曾有过一段时期为了外贸的需要，维持了一定限度的传统家庭副业。在人口压力日益增长下，“文革”时期大中城市大量技工回乡，在原有“工农相辅”的传统下，农民办起了公社和生产队的小工业。农业体制改革中农村里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解放了出来，进入了社队工厂。在苏南公社体制解体后，农工分了手，农业经营承包到户，而社队办的企业却没有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可以称作地方干部经营的社区所有制，所有权是属于乡或村全体居民的，管理权在各级行政领导手上。费孝通认为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因为在生产队的具体运作中他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

(2) 温州模式

温州虽也是沿海，人口密集，人多地少，但温州是个侨乡，该地农民一向有到海外经营小商业，用侨汇补贴家用的传统。温州不靠近工业城市，“文革”期间也没有条件发展社队工业。由于有经商的传统，在人口的压力下，起初只是卖工卖艺并偷偷地进行地区间的贩运。1984年改革的政策承认长途贩运的合法，温州大批流动人口成为一支公开的流通大军，在国内开辟了大市场。这支流通大军，为了供应已开辟的市场，回乡开办了家庭工厂。温州的家庭企业家庭作坊属个体所有，其经济类型属私有制。现在这些家庭作坊已出现“走向联合”的趋势，这是一种合作性质的集体所有制，这种合作组织常是以“亲戚”或街坊关系组成的作坊。温州和苏南两个地方由贫致富是一致的，但由于境遇不同，结果两地的经济结构也各有特色，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目前，股份制企业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股份制企业当然不全是家庭企业的联合，但对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股份企业试点区来说，这种股份企业的试点正符合当地家庭企业联合的趋势。在温州市，这种股份制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1/3，股份制企业已达1.3万家，其产值在1989年为21亿元，到1990年已达到31亿元。

(3) 珠江模式

费孝通认为“珠江模式是抓住了香港和内地工资差和地价差，不失时机兴起的，是香港经济的扩散。”^①它是以香港为中心向大陆扩散，形成了若干层次的同心的环形地带。第一环是深圳和珠海，这些地方已成经济特区。第二环是广州附近的东莞、中山、顺德、南海四个县。香港把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或车间向珠江三角洲转移，因而引起了珠江三角洲原来用在农业上的劳力和土地向这些新兴工业转移，引起了珠江三角洲附近地区农村的变化，形成

^① 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页。

了珠江三角洲工业发展区。香港工业如果进一步扩散，由珠江三角洲沿西江和北江延伸出去，前哨达到粤北和桂东地区，形成一个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带，这也可以称作是第三环。

至于以香港为中心，向大陆扩大得多快和多大，费孝通认为，“并不决定于香港的实力，而决定于我们的政策和投资条件。香港是个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是唤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其来其去决定于利润的高低和风险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内安定，开放政策不发生变动，最后限制这阵港风的将是具体的投资环境，其中水电和交通是决定性的条件。这个机遇能否抓得住，那要看我们自己是否有随势应变的能力。”^①

香港的工业和温州模式都是由商业带出来的，相同的是都属于小型工业，不同的是温州的市场在国内而香港却面向世界。再说上海的经济扩散和香港的经济扩散力相比，所形成的长江三角洲比珠江三角洲的企业是相形见绌的，苏南乡村企业发展紧靠上海这个工商中心，而上海却比不上香港，因为它本身还需要转轨，况且现在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不以工业为主，而是以信息为主了，在这方面香港比上海是居优势的。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费孝通教授一再强调，要从“因地制宜，多样模式”到“随势应变，不失时机”发展我们的经济。

4.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费孝通在《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一书中提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乡土社会发展到工业化后的现代社会，在这条道路上传统文化会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他认为，对传统文化的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和评估。要做到这点就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而是要从活生生的一个个人的具体生活、思想和精神状态中去观察和体会，以求得深刻的理解。

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前景，费孝通的观点是：“乡镇企业应从家庭工业化走向现代企业化，在保存集体所有，为农民服务，中小规模等特色的基础上，加强科学管理，引进现代技术。”^②在这个过程中，乡镇企业的领导者要加强理论学习，去掉多吃多占，任用亲朋好友等带有封建色彩的习气，尽快缩短由农民企业家变成现代企业家的距离。如果九亿农民在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家的带动下真正富裕起来，中国的经济就走上了光明大道。

责任编辑：王 颀

^① 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页。

^② 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